

明代心学家的 社会角色

——以颜钧的“急救心火”为例^{*}

明代心学家广泛涉入社会，扮演多种角色，所以在研究他们的历史时，应该以社会史及生活史来补充思想史。

本文只是一个尝试，希望藉明代后期发生在江西南昌的一个个案，也就是颜钧与罗汝芳的初遇，来说明心学家所扮演的类似心理咨商者的角色。

明代心学家广泛涉入社会，扮演多种角色，所以在研究他们的历史时，应该以社会史及生活史来补充思想史。

一方面是因为这也是其思想学说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们在与其他思潮竞争之时，他们在现实社会中所发挥的功能，他们如何说服人们，如何帮助其建立思想权威，并逐步成为领导性的力量。不过，关于思想家的社会角色，过去研究很少，本文只是一个尝试，希望藉明代后期发生在江西南昌的一个个案，也就是颜钧与罗汝芳的初遇，来说明心学家所扮演的类似心理咨商者的角色，并以它来说明一个有心理疾病的人在心学与程朱、心学与净明道之间依违徘徊，最后被泰州王门健将颜钧治愈而成为泰州学派领导人的过程。

一、颜钧的三种社会角色

关于这个个案的研究在过去是不容易进行的。过去对于这饶富历史意义的一幕大多透过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去理解，但颜钧的文集在他生前及死后皆未曾刊行，故黄宗羲显然并未读过颜钧的重要遗稿^①。后来的学者更未能读到，所以有关他的讨论总是围绕着有限的二手资料在进行^②。

本文写作过程中承陈弱水先生及程玉瑛女士提供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黄宣民点校：《颜钧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② 《颜钧集》的由隐而显本身便反映几种问题。首先，泰州学派那种纯任己心，纵横恣肆的思想显然与明末清初兴起的一种严明整肃的实学思潮不合，所以有关人士的著作大多就此隐没不彰，清代考证学兴起之后对明代那种游谈无根、凭着一主观的生命体验便到处（转下页）

《颜钧集》在 1990 年代出土，经黄宣民先生点校整理。从这一部新出土的集子，我们比较清楚地看到颜钧在当时所扮演的三种角色，第一是社区改善运动者，第二是打破士庶分别的讲学活动者，第三是类似心理咨商或治疗者的角色。在颜钧身上看到的，在明季心学家——尤其是泰州学派其他一些人身上，也多少可以看到。此处先谈他作为一个社区运动者的角色。

目前为止，我们对心学家从事的社会事业了解不多。不过从一些二手文献中可以得到一个印象，江西吉安地区的心学家——不限于王门中的那一派——颇热心于社区改善的工作。从一份对江西乐安县西南流坑村董氏的研究中，便看到王学之聚会讲学深入一个村庄的情形。江右王门学者对流坑村的社区与教化工作投注相当心力。流坑村的董燧是该地第一个求学于泰州王艮之人，此后他又将子侄及族人，介绍给江右的邹守益、聂豹、罗洪先作学生。董燧在当地主持重修董氏大宗祠，规划该村的社区环境建设，同时还在当地举办各种讲学，合董氏一族组“圆通之会”，邀邹守益等人前来讲学，并主持修纂族谱。王门弟子在整个江西地区扮演广泛而深入的角色，他们到处办乡约、修族谱，由于当地田赋的飞洒、诡寄、隐匿，以及新置田地不在国家登记之中等，使得田地负担

江西吉安地区的心学家——不限于王门中的那一派——颇热心于社区改善的工作。

王门弟子在整个江西地区扮演广泛而深入的角色，他们到处办乡约、修族谱，由于当地田赋的飞洒、诡寄、隐匿，以及新置田地不在国家登记之中等，使得田地负担之摊派日益不均，王门弟子协助政府，奔

（接上页）招摇的学风深以为病，故不可能欣赏，而思潮与书籍的刊行流布虽不必然有“银丁扣”般一对一的关系，但是其影响是异常明显的。在某一个思潮之下，某一类书便大量刊行，而与此思潮不相干的书也就沉没得无影无踪，在清代考证学最盛的时代，明代中晚期些原先没有声光的著作是不太出现的。细考出版史便知，而《颜钧集》便是其中之一。

走各地，推动丈田造册工作，讲堂变成直接督催各地乡绅参与丈田之指挥所，而“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之哲学也成为他们推动诸生积极参与之哲学根据。

颜钧悟道之后所做的第一件重要工作便是在他家乡从事社区工作。

阳明《传习录》在当时吸引大批中下层读书人，而且解决了许多人精神上的困惑。

之摊派日益不均，王门弟子协助政府，奔走各地，推动丈田造册工作，讲堂变成直接督催各地乡绅参与丈田之指挥所，而“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之哲学也成为他们推动诸生积极参与之哲学根据^①。出身江西的颜钧、何心隐虽是泰州王门，但是他们在当地从事的社区工作与江右王门颇为近似。

颜钧悟道之后所做的第一件重要工作便是在他家乡从事社区工作，先从一村做起，然后逐步扩大，希望以三个月为期，在一个乡的范围中完成社区风俗的改善工作。

颜钧于1504年出生于江西永新三都中陂村，十二岁开始读书，隔年随父赴江苏常熟为训导，同时就读于常熟学宫，此后，父亲连年多病，最后在他十七岁那一年病逝，他与兄长颜钦、颜铸护送灵柩归里。同年，长兄颜钦被推为粮长，因而家道中落，故失学居家，且不得娶，欲动又几丧生^②。颜钧失学居家，精神苦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528年二十五岁时。这一年他的堂兄颜钊从外地归来，给他一本手抄的《传习录》。值得注意的是，阳明《传习录》在当时吸引大批中下层读书人，而且解决了许多人精神上的困惑。王学的传播，不只是靠《明儒学案》或其他书中所出现的那些精英，事实上，有一大群散在各地的中

① 以上均见梁洪生：《江右王门学者的乡族建设——以流坑村为例》，《新史学》8：1（1997）页43—82。关于董樾求学泰州王门，见吴宣德：《江右王学与明中后期江西教育发展》（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页218。

② 颜钧：《履历》，《颜钧集》页33。

下层知识分子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当颜钧陷入极度苦闷之时，是阳明《传习录》解救了他。颜氏读到“精神心思，凝聚融结，如猫捕鼠，如鸡孵卵”时，为之感奋不已^①。而罗汝芳也是在极度苦闷时，其父授予一本《传习录》，才初步打开他的心结。罗父之所以提供这一本书给他的儿子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本来就是地方上一个王学的信徒。同样的苦闷，同样的《传习录》，同样的中下层王学者，同样的解答，这些讯息似乎反映了共同的时代精神。

颜钧再三玩味《传习录》，经过七日夜的静坐后得到开悟，然后又潜居山谷中九个月，才回家与母亲、兄长见面，并开始他聚众演讲耕读孝弟的活动。他在《自传》中形容说他的母亲非常高兴颜钧的表现，遂“发引众儿媳、群孙、奴隶、家族、乡闾老壮男妇”几近七百余人聚集在一起，由母亲命他“讲耕读正好作人，讲作人先要孝弟，讲起俗急修诱善，急回良心，如童时系念父母，常得欢心”这样五日、十日地讲，“果见人人亲悦，家家协和，踊跃奋励，虽少小童牧，尽知惭悔省发，皆知叩谢父母长上，竟为一家一乡快乐风化，立为萃和之会”。颜钧的“三都萃和会”顾名思义，他的工作已经由中陂村扩及三都乡了，该会举行半个月后，一乡老壮男妇聚集在他母亲之前叩首说：“我乡老壮男妇，自今以后，始知有生住世都在暗室中鼾睡，何幸际会慈母母子唤醒也。”一个月后，“士农工商皆日出而作业，晚皆聚宿会堂，联榻究竟”；三个月后，“老者八九十岁，牧童十二三岁，各透心性灵窍，信口各自吟哦，为诗为歌，为颂为赞”村庄中歌诗

颜钧再三玩味《传习录》，经过七日夜的静坐后得到开悟，然后又潜居山谷中九个月，才回家与母亲、兄长见面，并开始他聚众演讲耕读孝弟的活动。

颜钧一生到处讲学，他到处讲学的一个宗旨，就是要将他家乡的经历推行各地。不过，他的工作并不是要形成社会力量以抗衡政府或挑战政府的意识形态，相反的，是为了更有效地维持秩序与传统的伦理价值。

颜钧的第二种社会角色，即他作为一个草根性启蒙者的身份。

不绝“，喧赫震村舍，闾里为仁风也”^①。这三个月的社区工作因为颜母病丧而中止。但这三个月的经历对他有很大的影响，《自传》中说他觉得此段经历，与仲尼相鲁三月大治相仿佛，“可即风化天下之大本也”^②。守母丧毕，他开始出外游学，先在吉安地区流连，进谒这个地区的王门弟子，他将这三个月的经历及将它推展到全天下的抱负告诉他们，但是吉安地区的王门弟子们多不同意，“皆不识男子所诣，且恣疑叹：‘古之狂简，恐不类子。’”^③此后他师事刘邦采、徐樾，然后师事王艮。

颜钧一生到处讲学，常有“三月为程”一语。我们有理由推测，他到处讲学的一个宗旨，就是要将他家乡的经历推行各地。不过，他的工作并不是要形成社会力量以抗衡政府或挑战政府的意识形态，相反的，是为了更有效地维持秩序与传统的伦理价值。故其讲学的内容大多是要人安于自己的“分”，和睦相处，体谅他人的处境而给予同情的了解之类。

接着要谈颜钧的第二种社会角色，即他作为一个草根性启蒙者的身份。

颜钧早年举办的“三都萃和会”，是聚士农工商会讲一个月，他们白天外出工作，晚上聚宿“会堂”联榻参求。“会及两月，老者八九十岁，牧童十二三岁，各透心性灵窍”^④，足见从士、农、工、商、牧童、老者，皆是他教化的对

① 颜钧：《自传》，《颜钧集》页24。

② 同上。

③ 颜钧：《明姜八卦引》同上书页12。

④ 颜钧：《自传》同上书页24。

象。颜钧的《急救心火榜文》中也充分反映出他想跨越士大夫阶层，下及群众，故他说救心火馆的对象是“四方远迩仕士耆庶，及赴秋闱群彦与仙禅、贤智、愚不肖等”^①。颜钧本人在南昌同仁祠“得千五百友”^②，在泰州、如皋、江都各盐场流连三年多，从他学习者“但未记录姓名有几千百众也”^③。沧州守胡政为他召州县官吏、师生、民庶近八千人，斋道禅林亦聚数千^④，甚至在他被逮系狱时，也创“开元会”讲道理使得狱囚感动万分^⑤，足见他确有一套办法可以下及最底层之群众。此外像韩贞及颜钧的学生何心隐等人亦能如此。韩贞的故乡发生动乱，地方官吏“令化灾民”先生遂“驾小舟，遍历村落，作诗户喻之”^⑥。韩贞闲暇时，在劳动人民之间讲儒学；“虽田夫、樵子，未尝不提命之”^⑦；“无问工、贾、佣、隶，咸从之游”而且常趁着秋收后到各村讲学，歌声在村中此起彼落^⑧。这一类的例子非常之多，说明它们可能是儒家历史中唯一一次下及草根阶层的讲学活动，而这股力量一直到十七世纪左右才逐渐消退。

它们可能是儒家历史中唯一一次下及草根阶层的讲学活动，而这股力量一直到十七世纪左右才逐渐消退。

第三，要谈颜钧作为心理咨询者的角色。

第三，要谈颜钧作为心理咨询者的角色。

颜钧在三十六岁，也就是母丧九年之后才到泰州从

颜钧：《急救心火榜文》，《颜钧集》页2。

② 颜钧：《自传》同上书 页25。

③ 黄宣民：《颜钧年谱》同上书 页132。

④ 同上书 页140。

⑤ 《明史·儒林传》录自上书 页86。

⑥ 《乐吾韩先生遗事》同上书 页194。

⑦ 同上书 页191。

⑧ 耿定向：《陶人传》同上书 页188。

学于王艮门下，他在向王艮问学一年之后，趁科考回江西，于嘉靖十九年（1540）在南昌同仁祠贴出《急救心火榜文》，透过讲学活动来安顿人们的心灵，同时也带有心理咨询的作用。

心学家扮演心理咨询的例子相当多，前来求助者的心理问题也有程度轻重之不同，有些只是对生命意义感到困惑，有的是心理疾病。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去读心学家文集中那些师生问答的记录，就会发现除了哲学讨论之外，也有一些心理咨商的记录。老师通常是熟练的观察者，可以看出学生的问题并给予适当的引导。在传统中国社会，佛、道及其他民间宗教都提供这方面的协助，有的心学家也扮演起心理治疗的角色，而他们与佛道或其他民间宗教之间常常处在竞逐的状态，遇到心疾，有人声称禅宗才能救助，有人认为找心学家才是正途。

在传统中国社会，佛、道及其他民间宗教都提供这方面的协助，有的心学家也扮演起心理治疗的角色，而他们与佛道或其他民间宗教之间常常处在竞逐的状态，遇到心疾，有人声称禅宗才能救助，有人认为找心学家才是正途。

江右王门的胡直在《困知记》中便提供一个有趣的故事。胡直说他自己有心疾，原想飘然遐举离世独立，后来因为友人的劝告，拜访江右王门的罗洪先。罗氏最初并不甚喜谈良知，也不尽信阳明之学，专门以“主静无欲”教诲他们，胡氏虽然不是感到非常契合，但是也因为罗氏的“无欲”之训而知严取予之义。后来他拜访陈大伦，陈氏创明经书院，又延请乡绅邓钝峰居于院中为侣。邓氏是魏校弟子，亦曾游于欧阳德之门，后来专意于禅。胡直向他请教时，钝峰说：

汝病乃火症，当以禅治。

邓钝峰乃邀他每日静坐，“其功以休心无杂念为主，其究在见性”，这样坐了六个月，有一天他的心思忽然开

悟“自无杂念 洞见天地万物 皆吾心体。喟然叹曰：‘予乃知天地万物非外也’，自是事至亦不甚起念，似稍能顺应 四体咸安泰”，最重要的是胡氏十余年的心火之病改善了，晚上可以睡觉了^①。但是，他的心理疾病仍然没有痊愈 过了一段时间后 胡氏又“因起念 遂失初悟”。在极端困闷之时，他向阳明大弟子钱德洪求助，“钱公发明颇详”，但是他当时并不同意。突然有一天，同诸君游九成台，“坐地方欠身起，忽复悟天地万物果非在外。印诸子思‘上下察’ 孟子‘万物皆备’ 程明道‘浑然与物同体’ 陆子‘宇宙即是吾心’ 靡不合旨”。胡氏的心病其实仍未完全解决，不过在他心中却因为对治自己心理问题的经历而隐隐然在儒释之间分出高下^②。

胡氏的心病其实仍未完全解决，不过在他心中却因为对治自己心理问题的经历而隐隐然在儒释之间分出高下。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被心理疾病所困扰，上下求索，但又不能得到解决的例子。有人建议他向禅求救，有人建议他向心学家求解。他先是以禅医其“火症”，最后则是心学家钱德洪施以援手。胡直形容自己的心理疾病为“火症” 颜钧弟子何心隐的友人阮中和治清江境内“火疾”数十人的“火疾”也应该是指心理方面的治疗^③。

“心火”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汉代今古文之争有一个小题目，即如果以五脏与五行相配拟，究竟心是土脏

① 《明儒学案》（北京 中华书局，1985）页 521。

② 同上书 页 522。

③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册四，页 960。“火症”一词 明代文集中经常出现 譬如刘元卿《刘聘君全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台南 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 集部 154 册）中的《二生小传》描述刘孟材因禅坐而得“火病”。见该书卷七 页 51—52。

科举的残酷竞争及它所带来的高度挫折感，以及商业社会的汲汲求利，乃至于生活的困顿，及赋役负担、饥馑等都是造成“心火”的重要原因。

还是火脏，古文家主前者，今文家主后者^①。“心火”后来渐渐地用来指心理问题，一般是指心生烦恼而躁动，如火之上炎。唐代诗人白居易《感春》诗“忧喜皆心火，荣枯是眼尘”，杜荀鹤有诗“心火不销双鬓雪，眼泉难濯满衣尘”明代人也常使用“心火”一词。如魏校《庄渠遗书》中《与郑婿若曾》说：“火之为害更宜慎重 不必药饵 不必针砭 只是清心无为 便是上妙方也”又说：“心为君主 自焚则死”“诸痛痒疮皆属心火”^③。又如江右王门万廷言也说：“心，火也，性本躁动，夙生又不知费多少薪樵蕴积之 故光明外铄 附物蔓延 思虑烦而神气竭”^④。

在颜钧的种种文字中，“心火”一语一再出现。有时候他又说成是“名利心火”，足见他主要是指因为汲汲追求“名利”而烦恼不得解脱所引起的心理问题。从他的文字可以看出，科举的残酷竞争及它所带来的高度挫折感，以及商业社会的汲汲求利，乃至于生活的困顿，及赋役负担、饥馑等都是造成“心火”的重要原因。

因为本文是以颜钧治愈罗汝芳的“心火”为例，而罗氏的心火是由科举挫败引发的，故此处只讨论科举与心火的关系。

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在《重编本皇清经解》（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0）总页 13507。

白居易《感春》，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页 1190。杜荀鹤《下第东归道中作》，《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页 7959。

③ 魏校：《庄渠遗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五 页 20—21。

④ 《明儒学案》页 509。

对于明代士人而言，科举压力是造成心火的最主要原因。关于当时科举对士人及心灵的挫折感，学者已有讨论^①。有意思的是唐代杜荀鹤的“心火”诗也是因科举下第而作的。颜钧弟子程学颜、罗汝芳等都是因会试不第，极端困惑之下与他见面而受其感化的^②。而颜钧在《急救心火榜文》中又说“今逢大比，开科求贤，人才云集，乃自淮扬携友而敬（径）返棹洪都，择止同仁之祠为聚……”^③。颜钧抓住科考的场合必有许多因落第而产生心理困惑的士人的机会，在同仁祠设馆讲“急救心火”。

二、颜钧、罗汝芳与“急救心火”

颜钧在士大夫圈中崛起的一个关键性时刻便是在南昌同仁祠中治愈罗汝芳的心火之疾。

罗汝芳是江西南城人，比颜钧小十一岁。罗氏早年服膺明初程朱儒者薛瑄之学，却在遇到颜钧之后皈依王门，这一戏剧化的转变过程，是明代思想史中极富趣味的一幕。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卷三十四中是这样说的：

（罗汝芳）少时读薛文清语，谓“万起万灭之私，乱吾心久矣。今当一切决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体”。决志行之，闭关临田寺，置水镜几上，对之默坐，使心与水镜无二，久之而病心火。偶过僧寺，见

对于明代士人而言，科举压力是造成心火的最主要原因。

颜钧抓住科考的场合必有许多因落第而产生心理困惑的士人的机会，在同仁祠设馆讲“急救心火”。

颜钧在士大夫圈中崛起的一个关键性时刻便是在南昌同仁祠中治愈罗汝芳的心火之疾。

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在郝延平、魏秀梅主编：《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页5—7。

^② 《程身道传》，《颜钧集》页22。

同上书，页2。

有榜急救心火者，以为名医，访之，则聚而讲学者也。先生从众中听良久，喜曰：此真能救我心火，问之，为颜山农……先生自述其不动心于生死得失之故，山农曰：“是制欲，非体仁也。”先生曰：“克去己私、复还天理，非制欲安能体仁。”山农曰：“子不观孟子之论四端乎？知皆扩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如此体仁，何等直截。故子患当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先生时如大梦得醒，明日五鼓，即往纳拜称弟子。

上面这个故事可以分成两部分来看，第一部分是罗汝芳因力行薛瑄决去万起万灭之私，同时对水镜静坐而得“心火”之病。当时罗汝芳显然综合了两种传统，一是薛瑄决去万起万灭之私的主张，一是对水镜静坐的办法。第二部分是他如何遇到颜钧，然后颜氏如何医治了他的心病。兹更引史料，对上述两个阶段作较深入一点的析述。

当时罗汝芳显然综合了两种传统，一是薛瑄决去万起万灭之私的主张，一是对水镜静坐的办法。

罗汝芳早年的心病是一次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经历。他在不少文字中都反复提到他如何得到“心火”之病。如《盱坛直诰》中这样记着：

辛卯（1531）学宪东沙张公刻颁二子粹言，师（罗汝芳）悦玩之，内得薛文清公一条云，万起万灭之私乱吾心久矣，今当一切决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体。若获拱璧，焚香扣首，矢心必为圣贤。立簿日记功过，寸阴必惜，屏私息念，如是数月，而澄湛之体未

① 《明儒学案》卷三十四 页 760—761。

复。壬辰，乃闭户临田寺中，独居密室，几上置水一盂、镜一面，对坐逾时，俟此中与水镜无异，方展书读之，顷或念虑不专，即掩卷复坐，习以为常，遂成重病。

他也曾说：

年至十五，方就举业，遇新城张洵水先生讳玘，为人英爽高迈，且事母克孝，每谓人须力追古先。于是一意以道学自任，却宗习诸经各样工夫，屏私息念，忘寝忘食，奈无人指点，遂成重病^①。

在另外一个场合中罗氏这样回忆：

某初日夜想做个好人，而科名宦业，皆不足了平生，却把《近思录》、《性理大全》所说工夫，信受奉行，也到忘食寝、忘死生地位。病得无奈，却看见《传习录》说诸儒工夫未是，始去寻求象山、慈湖等书。然于三先生所谓工夫，每有罅碍。病虽小愈，终沉滞不安。

以上几段文字记录了一个渴切寻道的年轻人，因为求索个人生命存在的问题，而由程朱一派改宗陆王心学的过程。当时想必有许多人发生了类似的改变，而造成了心学的大行。

前面提到，罗汝芳先前读了薛瑄“万起万灭之私，乱吾心久矣。今当一切决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体”，决定

以上几段文字记录了一个渴切寻道的年轻人，因为求索个人生命存在的问题，而由程朱一派改宗陆王心学的过程。当时想必有许多人发生了类似的改变，而造成了心学的大行。

① 《盱坛直论》（台北：广文书局，1977），页219。

② 《明儒学案》卷三十四 页781

③ 同上书 页789—790。

一个现代读者如果打开《理学粹言》一书，很快便会见到这段文字，顺着读下来，便会发现整本小册子都在讲无欲、讲制欲、讲去念。

刻苦实行。这一段话，是薛氏《理学粹言》中的一段，最末句今本作“湛然之性”^①。一个现代读者如果打开《理学粹言》一书，很快便会见到这段文字，顺着读下来，便会发现整本小册子都在讲无欲、讲制欲、讲去念^②。罗汝芳很兴奋地照着做，想尽办法要制欲、要去念、要达到无欲的境界，但是心病也很快就出现了。罗汝芳的父亲对阳明思想有相当的了解，他发现罗汝芳的病状后，原本以为他是在性方面“斲丧”过度，后来知道其子所患是心病，故给他一本《传习录》：

前峰公谓师（罗汝芳）由斲丧，咎之。师乃直述其故，曰儿病由内非由外也，惟得方寸快畅，于道不逆，则不药可愈。前峰公遂授以阳明王先生《传习录》，指以致良知之旨，师阅之大喜，日玩索之，病瘥^③。

这里提到罗汝芳读《传习录》后“病瘥”，但是，实际的故事并不这样简单。真正把他从心病中解救出来的是颜钧。

前面已经提到过，颜钧是王艮的弟子，他服膺王艮的《乐学歌》，故说：“引发乐学，透入活机，会而通之。知是

① 《薛瑄全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页1506。

譬如：“一念之非即遏之，一动之妄即改之。”（《薛瑄全集》页1506）“念虑一毫杂妄即非仁，便当克去。”（页1506）“惟无欲最高，有欲则低矣。”（页1508）“先儒曰：‘欲心一萌，便思义理以胜之’，即窒欲之要也。”（页1509）“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祸流于滔天。”（页1513）“人欲尽而天理见，如水至清而宝珠露，人欲深而天理昏，如水至浊而宝珠暗。此先儒之常说，但先儒以气禀言，瑄以人欲言。”（页1520）

③ 《盱坛直述》页219—220。

昭心之灵 乐是根心之生 ”；破荒信、彻良知 洞豁乐学 ”。但颜氏到处游历，发现到处都有“心火”的问题——“人人心火，忙里堪舆，各各心红，营为宇宙。咸将秉彝同然，竟自支分灭息、汨没天真”^①。此处“忙里堪舆”的“堪舆”二字为“天地”之意，《淮南子·天文训》“堪舆徐行，雄以音知雌”，许慎便注曰“堪、天道也 舆、地道也”。所以颜钧的意思是“忙里天地”，也就是说整个天地皆忙忙碌碌之意。天下人忙忙碌碌，为名为利，将人心原来所共有的良知汨没了，而有“免心”、“攻心”、“欲心”、“去心”、“困心”、“贪心”、“戕心”，他要人知道人生所有常变、顺逆、安恬、烦恼、拆裂，皆是由命定于天，“岂用人心火而得探求之耶”！他要“单洗思虑嗜欲之盘结，鼓之以快乐，而除却心头炎火”要人人“先正其心 完复天真”^③。他并且希望官府能容他设“馆”，专门救人“心火”。

颜钧要“单洗思虑嗜欲之盘结，鼓之以快乐，而除却心头炎火”，要人人“先正其心，完复天真”。

这里面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他提的急救心火“馆”。在南昌同仁祠，是临时借用原有的公共空间，但颜钧有时也提及“会所”。譬如他在扬州讲学时便设有“会所”，邀请会众进行每次五日的讲学^④，这五天的食宿都在“会所”内。这种“会所”可能不是临时性的场地。王畿不时提到的“会所”，也当与此同性质。供给五日食宿及建立这种“会所”显然需要相当财力，所以颜钧在《道坛志规》中说

供给五日食宿及建立这种“会所”显然需要相当财力，所以颜钧在《道坛志规》中说办“道坛”的前提是要能“理财”。

以上见《急救心火榜文》，《颜钧集》，页1—2。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上海：上海书局，1996），卷三，页82。

《急救心火榜文》，《颜钧集》页2—3。

颜钧：《扬城同志会约》同上书页29。

任何组织，
不管他们宣称
要如何辅翼朝
廷，还是被以高
度警戒的眼光
注视着。

办“道坛”的前提是要能“理财”^①。我们现在没有资料可以说明他们资金的来源。

颜钧虽然知道明帝国对任何私人组织都很戒惧，即使这些组织宣称自己从事的是教导人们安分守己，以辅翊王化为目标，也一样引起侧目。任何组织，不管他们宣称要如何辅翼朝廷，还是被以高度警戒的眼光注视着。颜钧在《急救心火榜文》中，便非常戒慎恐惧地表示“先申道宗藩、二院三司达尊，广扩忘分薄势之度，宏开好善兴贤之仁，容农假馆，救人心火，以除糜烂，翊讚王化，倡明圣学”，表示他扮演的是帮助政府维持教化，维持既定秩序的角色，希望各级长官容许他开馆^③。

他所提出解救“心火”的办法是“单洗思虑嗜欲之盘结，鼓之以快乐而除却心头炎火”。“专辟形骸凡套之缰锁，舞之以尽神而尽涤性上逆障”^④。是鼓舞性中原有之乐，正面的扶持人心中原有的善端，而不是消极压制心中之欲望。

颜钧上面这些话显然是针对程朱一派压制欲望而说的。他同时也不认为佛道家的修心炼度是正确的办法。颜氏敌视佛教的态度，在各种文字中亦有所表露^⑤。故他

颜钧：《道坛志规》，《颜钧集》页31。

② 《急救心火榜文》，同上书，页2。

衡诸颜山农与他的学生何心隐之命运，一曾被逮捕，一被杖杀，而罪名都有些勉强，他们触法的原因之一恐怕与发展、鼓动民众不无关系。

④ 《急救心火榜文》，《颜钧集》页3。

同上书，页2。

⑤ 如颜钧《论三教》一文中记“天下有混二氏者，盍反观内省，自心自知，孰虚孰实，可亲可弃哉？”同上书，页16。

在《榜文》中宣称自己所要医治的，不只是士农工商，而且包括仙禅^①，我们似乎不能忘记，心学家虽然从佛、道那里吸收了许多养分，但他们最终仍要与佛、道相争持。王艮在泰州撤神佛像作《孝弟箴》，颜钧也是排斥二氏，写了《论三教》痛斥佛、道^②，而他的学生韩贞也是在极端苦闷中，先是求长生，继闻樵夫朱恕讲孔孟，才豁然改宗。韩氏也说“长生久视，吾弗为之”^③。他们都刻意想将人从程、朱及佛、道那里扳过来。

心学家虽然从佛、道那里吸收了许多养分，但他们最终仍要与佛、道相争持。都刻意想将人从程、朱及佛、道那里扳过来。

颜钧与罗汝芳初见而，罗汝芳自述他如何用力于不动心于生死得失的学问，颜钧一听，马上回答说“是制欲，非体仁也”。罗汝芳说“克去己私，复还天理，非制欲，安能体仁”，颜钧反驳说他是“患当下日用而不知，忽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④。而颜钧用以治疗罗汝芳“心火”的办法便是鼓舞他扩充善端，反对罗氏原来压抑欲念的做法。刘此，贺贻孙（1605—1688）所作《颜山农先生传》中有更畅快淋漓的描述：

而颜钧用以治疗罗汝芳“心火”的办法便是鼓舞他扩充善端，反对罗氏原来压抑欲念的做法。

先生（颜钧）一见即斥曰：“子死矣，子有一物，据子心，为大病，除之益甚，幸遇吾，尚可活也。”罗公曰：“弟子习澄湛数年，每日取明镜止水，相对无二，今于死生得失不复动念矣”，先生复斥曰：“是乃子之所以大病也，子所为之者，乃制欲，非体仁也。欲之病在肢体，制欲之病乃在心矣。心病不治，死矣。”^⑤

① 《急救心火榜文》，《颜钧集》页 2。

② 《论三教》同上书 页 15—16

③ 《乐吾韩先生遗事》同上书 页 190、193。

④ 《明儒学案》卷 34 页 761。

⑤ 《颜钧集》页 82。